从政归中书到权属一人:南宋史弥远专权之路

韩　冠　群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玉津园之变后,南宋的部分士大夫舆论指向了韩侂胄作为近习权臣的特点,他们期望权力回归中书,为了防范近习权臣再次出现,他们提出令太子参政的方案,这与宁宗无心政事、有意让太子参政的想法不谋而合,嘉定资善堂会议得以成立;另一些士大夫则主张重建皇帝亲擢台谏、并任宰辅的中枢格局,但这却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以致史弥远在资善堂会议的掩护下,借助于皇太子的力量,完成了对政治对手的清理,最终实现了从政归中书到权属一人的转变。宁宗朝权属一人局面的形成,正是士大夫舆论、宁宗个人能力、史弥远政治手段等多维因素共同推动所致。

关键词:南宋;史弥远专权;士大夫政治舆论;资善堂会议;皇太子;宋宁宗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7)03-0149-08

史弥远是南宋中后期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后被称为权相或权臣。史弥远以其独掌朝政 25 年的政治历程而成为研究焦点,学者对其在玉津园之变、宋金和战、雪川之变、北方忠义军的处置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具体作为、历史影响多有论述。不过,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史弥远专权已然成立展开的,而对于其专权为何能够实现、与韩侂胄专权有哪些区别等问题尚有不同观点。前辈学者如虞云国、寺地遵、何忠礼、戴仁柱大致认为:史弥远的上台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只是史弥远取代韩侂胄担任官僚机构的领导而已[1-4]。日本学者小林晃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韩侂胄、史弥远是两个权力形态完全不同的政权,史弥远政权的成立代表了士大夫舆论推动下的以宰执为领导的政治体制的恢复,是对韩侂胄专权的反命题,他尤其关注嘉定资善堂会议和枢密院承旨司的宰相直辖对史弥远政权的意义①。这一观点很有启发性。不过,未解之惑仍不少。士大夫群体的舆论是否完全一致?嘉定资善堂会议究竟掌握了哪些权力?其对史弥远和其他宰执大臣的意义有何不同?士大夫理想中的"权归人主,政出中书"②的中枢格局为何最后演变为一相擅权?这些问题的研讨,对于进一步探明这一时期中枢权力形态的演进、理解南宋所谓的"权相政治",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本文拟尝试挖掘史弥远自玉津园之变直至实现独相专权的历史演变过程,从中枢政治的"内在理路"③上作出更多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　玉津园之变后士大夫政治言论与政治选择

韩侂胄被诛杀后,宁宗先后在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5]746、嘉定元年(1208)正月[6]2536 两次下诏令群臣直陈朝政缺失,充分表达出渴望臣僚进言的诚意。之后,真德秀、王居安、钱象祖、蔡幼学等人纷纷上奏论事。小林晃对此有细致的剖析,认为这些批

收稿日期:2016-12-14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9 批面上资助项目"南宋孝光两朝中枢政治运作研究"(2016M59169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冠群(1986—),男,河北邯郸人,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宋代政治制度史。

评都指向了韩侂胄的独断政治,而这一专权模式上承自宋孝宗,实际上是对宋孝宗以降的皇帝独断模式的批评[7]。笔者并不认同小林晃对韩侂胄统治方式的论断,但若换一种表述方式,即上述批评都传达出士大夫对权力回归中书的强烈愿望,而资善堂会议的设置则促成了这一愿望的实现,却是本文所赞同的。同时,我们也须注意到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还有部分士大夫对当时的政治批评走得更远,但他们的声音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的理想方案亦没有相应的实现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之后的政治走向。他们希望权力回归中书,他们也赞同资善堂会议的设置,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真德秀、王居安等人的主张是一致的;但在史弥远、钱象祖等人上台后,他们敏锐地观察到史弥远的强势足以压倒其他宰执、实现一人专断,很有可能转变为第二个韩侂胄,于是他们在主张权力回归中书的同时,也注重防范一人独断、群臣拱默局面的出现。以下对士大夫舆论的分析侧重对后者的关注。

在嘉定元年(1208)上书臣僚中,尤其以右丞相钱象祖的上奏最为典型。这一奏札虽为刘宰代笔,但无疑反映了钱象祖的看法。对此奏札,小林晃的分析尚有遗漏。为便于讨论,现引述如下:

> 国家萃几务于中书,而总之以二三大臣。此其任甚重,其责甚专。昨自愉人弄权,率意妄作,政令之施设,始有不由中书,人才之用舍,始有不由廊庙。予夺失当,措置乖方,迄至年来,毒流华夏。……故臣愿陛下自今以始,凡举一事,凡用一人,若大若小,若内若外,必与臣等公议而公行之。凡特旨内降,一切不出,或犹有蹈常袭故者,容臣执奏,一切不行。庶几国是不摇,幸门不启。或臣等议有未尽,行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纠正,必无偏党,上累圣知。此臣所以不得不先为陛下言者一也。[8]451

钱象祖的上言,包含两个层次意涵。其一,自韩侂胄当国以来,原来负责国家政务的中书(宰臣)权力被侵夺,政令施行不由中书,人才任用不由庙堂,以致于给国家带来很大危害,他请求皇帝今后不要使用特旨内降,允许臣僚执奏,任何大小设施都须和外朝宰臣公议之后遵守规章实行,这样近习④亲倖就不会乱政。其二,政务归于中书后,如果宰臣的议论、做法有不恰当之处,有给舍缴驳,有台谏纠正,这样便无偏无党,保证公正行事。可知,钱象祖主张恢复的是政务归于宰臣、台谏给舍拥有相应的缴驳权的中枢格局。然而,政局的发展很快超出了他的预期,同知枢密院事史弥远"以枢廷造命,除从官",直接越过丞相钱象祖而自行其事,钱象祖遂请求去位。

另一位士大夫倪思对此问题更为警觉。韩侂胄被诛后,倪思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入见宁宗,他说:"大权方归,所当防微,一有干预端倪,必且仍蹈覆辙。厥今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今侂胄既诛,而国人之言犹有未靖者,盖以枢臣犹兼宫宾,不时宣召。宰执当同班同对,枢臣亦当远权,以息外议。"他所说的"枢臣","谓史弥远也"[5]12115。他认为,大权方归于皇帝,朝臣仍然担忧同知枢密院事史弥远不时被宣入内廷,因此,他提醒宁宗不可单独召见史弥远一人,宰执群体应当同班同对。后来,"弥远以枢廷造命,除从官,宰相钱公象祖数请去"[9]卷八十五《显谟阁学士特赠光禄大夫倪公墓志铭》,倪思又言:"奏拟除目,宰执当同进,比专听侂胄,权有所偏,覆辙可鉴。"[5]12116可知,枢廷造命所除授官员实际上是史弥远的私意;而偏信一人的后果则有韩侂胄前车之鉴。史弥远上章自辩,倪思求去;宁宗挽留他,倪思再对:"前日论枢臣独班,恐蹈往辙,宗社堪再坏耶?宜亲擢台谏,以革权臣之弊,并任宰辅,以鉴专擅之失。"[5]12116倪思提出的防范措施是由皇帝亲自拔擢台谏官以及同时任用两名甚至多名宰辅而不是独任一人,使他们互相牵制。这无疑是鉴于史弥远权势日盛而提出的最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让史弥远怀恚不已,倪思遂出知镇江府。

嘉定元年(1208)五月,刑部侍郎何异也上封事言:"近日号令或从中出,而执政不得与闻其事,台谏不得尽行其言"[5]12167,表达了同样的忧虑。

不只是倪思、何异,黄度、王介也注意到这一状况,并提出了相同对策。嘉定元年(1208)六月,黄度被任命为吏部侍郎,抱病入见皇帝。当时史弥远虽未升至宰相,但威权之势已经显露。黄度意味深长地说:"高宗之任秦桧,专矣,而险毒害正,天下多故。高宗收还威柄,而后复安。陛下前日用韩侂胄,亦专矣,而败坏天下,至于不可支持。今威柄复还,正与高庙同。高庙末年,宰执常兼任,欲其协和,同济国事而已。愿陛下更留圣意。"又说:"给舍、台谏,人主自用之,则威权在己。或臣下得而用之,则威权去矣。"[10]221黄度说的"宰执常兼任",与倪思说的"并任宰辅"意涵相同,他也建议宁宗同时任用两名或多

名宰执，亲自拔擢给舍、台谏官。宁宗对此“皆然之”，但从以后的政局演变看，宁宗并没有真正领会黄度的良苦用心。王介也上言：“人主之权莫大于自用，而亦莫难于自用”，建议宁宗要亲揽大权，不可太阿倒持；但宁宗的做法是“天子慊然，终不肯自用，史弥远遂以一相颛国”[11]卷四十六《宋集英殿修撰王公墓志铭》。

亲擢台谏、并任宰辅的对策很务实，但具体到实践层面，则对皇帝的政务处理能力、人事驾驭能力要求很高。宋高宗那样的老奸巨猾之辈尚可以应付，而宁宗这样资质平庸、性格软弱、缺乏主见、容易受人左右的人则很难做到⑤。

以史弥远、钱象祖、卫泾等为核心的政变集团，自诛韩的第一天起，就深知掌握台谏官的重要性。政变当天，礼部尚书卫泾出任御史中丞，著作郎王居安改任左司谏，吏部侍郎雷孝友为给事中[12]187。这三人的任命十分怪异，除王居安还算是升迁外，其他二人以尚书、侍郎而为中丞、给事中，以资序论，等同于谪降。当时情势下，台谏官和侍从官此前均为韩侂胄党羽据有，这两个要害部门一主舆论喉舌、一主封驳政令，尤须把握在手，故政变集团作出了这种非同寻常的任命。然而，这种奇怪的任命却被宁宗懵懵懂懂地通过了。这也表明：从一开始，宁宗就不明白台谏、侍从官的重要性，拱手让出了对台谏、侍从官的任命权。之后，除授权外，台谏官完全归于外朝宰相之手。史弥远在与其他宰执竞争的过程中，除了皇太子的暗中协助，重要的助手就是台谏官。

并任宰辅的实施难度更大，尽管倪思三番四次地告诫宁宗宰执同班奏事的重要性，但宁宗置若罔闻。据倪思的上言推测，史弥远自开禧三年(1207)十二月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就开始独班奏事了。此外，史弥远还获得了留身独对的机会。在其去世后，魏了翁将“留身止于宰相，堂帖或用空头，宣押不及报政”之弊视为“故相之失”[9]卷十九《被召除授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二札》。绍兴以来，三省枢密院多是同班奏事，而史弥远却是独班奏事，这意味着他可以径直绕开其他宰执和皇帝商议政事，获得圣旨。倪思称：“侂胄盗权擅国，专行执奏，所称圣旨类杂己意，今弥远亦独班奏事矣。”[9]卷八十五《显谟阁学士特赠光禄大夫倪公墓志铭》韩侂胄就是利用“所称圣旨类杂己意”的手段实现专权的，史弥远显然是在步韩侂胄的后尘。嘉定元年(1208)十月丙子，史弥远升至右丞相，南宋朝廷出现并相局面。然而，宁宗却不知道如何驾驭两位宰相，我们也看不到他的作为。十二月戊午，史弥远因母亲去世而丁忧去位。这对宁宗“收还威柄”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完全可以令史弥远完成二十七个月的守制，彻底打压下炙手可热的右丞相。但宁宗却不明就里地同意了太子的请求，赐第临安，后来还派内侍赴庆元府召回史弥远。虽然史弥远最终拒绝了，但由此可见宁宗的颟顸。

除了自身理政能力较低，宁宗的治国理政观念对此也有影响。黄裳曾经担任嘉王府翊善长达五年多，对宁宗的教导耗尽心力，重病之时还不忘叮嘱宁宗：“委任大臣，政出中书，万事坐理，此正得人君好要之道。奖用台谏，每有弹劾，无不听从。善恶区分，纲纪振立，此正得祖宗设官之意。”并告诫他：“此二事者，朝政之大者也……陛下虽终身守之可也。”[13]1832-1833从之后的实际作为来看，宁宗大体上接受了他的教导。在宁宗看来，无论是韩侂胄还是史弥远都是可以信任的大臣，自然要委任于他们，君主自己亲揽大权反而是不可理解的事情，故他对臣僚的建议不予采纳。

嘉定二年(1209)五月丙申，守制仅半年的史弥远起复。当时钱象祖已经去位，执政均为与史弥远关系密切之人，台谏言官也为其掌握，故几乎没有官员对史弥远的起复公开提出异议。只有时任四川宣抚使的安丙移书史弥远道：“名教所系，人言可畏，望阁下速辞成命，以息议者之口”，但史弥远置之不理[5]12191。国子祭酒王介也认识到史弥远的强势，上言：“汉法天地降灾，策免丞相，乞令弥远终丧，择公正无私者置左右，王、吕、蔡、秦之覆辙，可以为戒。”[5]12154在王介看来，史弥远有可能成为王安石、吕惠卿、蔡京、秦桧一样的权相，但宁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史弥远独相专权态势已然形成。

二　嘉定资善堂会议的权限及对史弥远的意义

嘉定元年(1208)闰四月甲申，宁宗下诏：自今每遇视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执赴资善堂会议；第二天，又命钱象祖兼太子太傅，卫泾、雷孝友、林大中兼太子宾客[12]198。这就是嘉定资善堂会议。此前开禧三年(1207)十二月乙丑，史弥远拜同知枢密院事时已经兼任太子宾客，之后一直兼任东宫官。对于这一会议的具体作用，小林晃认为是打压侧近武臣，压制自孝宗以来的独断政治，恢复宰执的决策权。这里小林晃仍然是将其同宋孝宗与韩侂胄的统治方

式等量齐观,笔者对此持有异议。韩侂胄出身外戚,其个人专权的实现需要依附于皇权而不完全借助于外朝士大夫,故当钱象祖、史弥远等文官集团上台后,一方面恢复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模式,另一方面也对武官或者所谓的近习干政进行打压。从这一角度讲,资善堂会议的设置,的确是要把韩侂胄所掌握的权力收归于外朝宰执群体。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于皇帝与宰辅大臣来说,资善堂会议设置的目的又有不同。以下就资善堂会议的设置过程、运作方式以及与史弥远上台之间的关系等作进一步阐述。

关于资善堂会议的最初倡议者,小林晃强调它是钱象祖、史弥远等人主动提出的,但我们尤其不应该忽视宁宗的意志。让太子参政,虽然由政变集团中的赵彦逾在经筵时候提出,但宁宗自己早有此意。据卫泾记载:"臣等蚤上奏事间,恭奉玉音:'皇太子参决事,朕有此意甚久。昨日赵彦逾经筵求去,奏及此,此事断自朕意,不欲因人言批出,卿等可商量教稳当,欲待批出。'"[14]626 宁宗强调这一决定是"断自朕意,不欲因人言批出",即这是皇帝自己的决断,不愿意出自臣僚的请求而批出。可见,当时宁宗对掌控朝政的兴趣不太大,又见皇太子已经成年,故有意让皇太子参决政务。钱象祖、卫泾、史弥远等人对设置资善堂会议也有自己的目的。据卫泾记载:"臣象祖等惟朝殿奏事,得侍清光,退后凡有事件,多是缴入,非时无缘可得通达内外之意。所以向来韩侂胄因此得以窃弄威福,稔成奸恶,几危国家。今得皇太子会议,臣等奏事既退,或陛下有所宣谕,或臣等有敷陈未尽之意,皇太子于侍膳问安之际,皆可以从容奏禀,内外不至扞格不通,且更不容外间别有人出入禁闼,干预朝政,岂非宗社大幸?"[14]626 此前韩侂胄正是依靠"出入禁闼"而实现对朝政的干预,政变集团需要防范再次出现这样的人,故建议皇太子发挥沟通内廷与外朝的作用。这正与宁宗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宁宗君臣最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我们不仅要看资善堂会议设置的初衷,还要考察设置之后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到底具有处理哪些政务的权力、从哪种意义上说是收回宰执的决策权等问题。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史籍并没有很多的记载,但嘉定资善堂会议是参照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和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两次"故事"来设置的,或许我们可以从其运作方式中窥探一二。

天禧四年(1020),真宗屡次"不豫",无法处理朝政,遂让皇太子赵祯监国,中枢大臣兼任东宫官,商议朝政。十一月庚午,诏:"自今中书、枢密院诸司该取旨公事仍旧进呈外,其常程事务,委皇太子与宰臣、枢密使已下,就资善堂会议,施行讫奏。"[15]2226 可见,太子与宰臣、枢密使处理的只是常程事务,其他事务仍需进呈取旨。十二月乙酉,中书、枢密院上言:

> 请自今遇只日承明殿不视事,则入内都知传宣中书、枢密院诣太子资善堂议事。应时政及后殿军头司公事素有定制者,施行讫奏。系迁改升降者,送中书、枢密院进呈取旨。如无公事,则宰臣、枢密使已下,遇参辞谢皇太子,许二三人已上为一班,诣堂延见,自余官僚,并止留牓子。[15]2228

奏言首先确定了资善堂议事的频率,即在只日承明殿不视事时候,宰臣入堂议事;其次,规定了政务处理范围为时政事务以及原来由真宗在后殿处理的军头司事务,其中素有定制的,施行后上奏即可,若涉及升改迁降者,仍需中书、枢密院进呈取旨;第三,如没有公事,宰臣枢密使以下的官员遇朝参、入辞、入谢皇太子之事则分班延见于资善堂,其他官员只需留下牓子奏事。可见,资善堂会议主要分去了两部分政务:一是部分时政事务以及原来由真宗在后殿处理的军头司有定制的事务;二是原来向真宗参、谢、辞的京朝官、幕职州县官等分班引见事宜。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仁宗即位后的天圣六年⑥。自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到天圣六年(1028)的八年时间里,文官与部分武官铨选除授以及禁军的常规事务均转移到资善堂来处理。虽然皇太子按时出席会议,但由于赵祯才十二岁,不具备处理政务的能力,这些政务还是由宰执大臣裁决的。

淳熙十四年(1187),孝宗令太子参政,也是嘉定资善堂会议参照的先例。倪思进言:"乞用淳熙例,令太子开议事堂,闲习机政。"[5]12116"淳熙例"即指淳熙十四年(1187),孝宗倦勤,准备禅位于光宗,遂命太子开议事堂会议,裁决政事,历练能力。十二月,孝宗降出指挥:"皇太子可隔日就议事堂参决庶务。如有差擢,在内自寺监丞,在外自守臣以下,悉委皇太子与宰执同议除授以闻。"[16]职官1之67,2974 次年(1188)正月,皇太子首次参决庶务,理政范围调整为:"内自寺监丞,外自守臣以下,悉举宰执同议,除

授讫以闻。守臣上殿参辞，除侍从外权免，并于议事堂纳札子，择其可施行者，同宰执将上取旨。”[16]礼49之50，1813可知，淳熙资善堂会议负责的政务有两类：一是内自寺监丞、外自守臣以下的官员除授事宜；二为接受地方知州等官员朝参、朝辞时所纳的札子，选择实际可行的，同宰执上奏取旨。就政务范围言，与天禧资善堂会议有不少相同之处。官员除授需要“悉举宰执同议”，地方官员的札子也需要“同宰执将上取旨”，可见宰执群体发挥着较大作用。

嘉定资善堂会议是参照以上两次会议而设置。就开设频次言，《宋史》载：“诏御朝太子侍立，宰执日赴资善堂会议。寻用天禧故事，宰辅大臣并兼师傅、宾客。”[5]8735王应麟的记载相同[17]2391。《续编两朝纲目备要》载：“自今每遇视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执赴资善堂会议。”[12]198卫泾也言：“已降指挥令臣等并兼东宫官，日赴资善堂会议。”[14]627可知，宰执需每日赴资善堂会议，比天禧和淳熙会议的频率都高。会议的地点前后也有变动。嘉定元年(1208)闰四月丁亥，太子出居东宫[12]198，但此时太子与宰执大臣参决事务仍在资善堂。按照宋代制度，皇太子未出阁，听读就学在资善堂，若已受册封则应当出居东宫[5]3599。故宰执认为：“皇太子……既居新宫，不应特以会议之故再临旧所讲学之地，既未合典礼，亦非所以示观瞻。况臣等备数宫僚，许陪侍讲学，因而会议，于势便顺”，请求皇帝改变会议地点；五月八日，宁宗同意宰执请求，令宰臣就在东宫讲堂会议[14]627。此后，会议地点就由资善堂迁至东宫。

至于处理政务的层次范围，当与淳熙资善堂会议接近。嘉定十三年(1220)皇太子薨，郑昭先为其撰写的谥册文言：

> 即青宫而议事，陪丹扆之视朝。辅列大臣，盖踵天禧之故典；参决庶务，聿遵孝庙之宏规。……阅一终而再岁，中外乂宁；凡四荐于贰觞，神示昭格。[16]礼43之13，1687

“青宫”，即是太子所居的东宫；“即青宫而议事，陪丹扆之视朝”，是指宰执大臣赴东宫与皇太子议事，皇帝视朝时皇太子侍立殿廷。由“参决庶务，聿遵孝庙之宏规”可知，其每日处理的都是“庶务”，而且遵守着孝宗淳熙十四年的规定。“一终”，指十二年；“阅一终而再岁，中外乂宁”，是说太子参决庶务十三年，使得中外乂安。由此可证，嘉定资善堂会议实行了十三年，一直到太子去世。除此之外，宰执群体的官衔也是有力证据。自嘉定元年(1208)闰四月至嘉定十三年(1220)七月皇太子去世，共有十二位宰执，除丘密仅担任一个月的同知枢密院事就去世而不可考外，其余均兼任东宫官[18]1350-1403。也可证，宰执兼任东宫官赴东宫议事，是一直实行着的制度。若以上推断大致不误，则嘉定资善堂会议处理着与淳熙类似的政务。

而在韩侂胄上台后，由于掌握了负责臣僚与皇帝交流通进的阁门司，故在京的“百司奏牍、文武近臣表疏”需要经由阁门上达，新授“两省、御史台官、尚书省六品以上，诸司四品以上”须先到阁门上表举官自代，然后入谢[19]。有材料显示，钱象祖等人对阁门司进行了改革，“陛下收还大权，一正纲纪，……今者阁门建请将阁门近日循习弊事并行厘正，尤为允当”[20]301。改革显然是针对韩侂胄擅权的，但具体措施已不得而知。如今这部分权力归于资善堂会议。其次，韩侂胄先后任用苏师旦、史达祖等吏人卖官鬻爵，紊乱法度，以致出现“师旦既败，即有三省、枢密院人吏史达祖、耿柽、董如璧三名随即用事，贿赂公行。……三吏用事以来，监司、郡守、职事官亦以货取，侂胄进退用舍，惟三吏之言是听”[16]职官78之62，5222的乱象，而通过钱象祖等人的改革，原来由韩侂胄掌握的官员任命权也回归于外朝宰执和太子手中。从这一角度说，资善堂会议的设置，保证了原来由韩侂胄集团掌握的部分权力回归于外朝宰执和太子手中。

但就宰执群体内部而言，无论是在钱象祖罢相之前还是之后，史弥远个人的决断权力都超过了其他宰执。在独相之前，他一直拥有独班奏事的权力；在独相后，则掌握了从执政到台谏、侍从的任命权。那么，他为什么会同意这一设置呢？可能是出于利用太子的考虑。由于史弥远和皇子赵曮最早建议宁宗诛杀韩侂胄，所以他们获得了最大收益。诛韩后十余天，赵曮被立为太子，史弥远也一次次晋升，迅速位列执政。嘉定元年(1208)四月的宰辅成员是：钱象祖是唯一的宰相，任右丞相，楼钥、林大中、卫泾、雷孝友、史弥远等人为执政官。这年正月壬辰，史弥远刚刚升迁为知枢密院事。在众多中枢成员中，史弥远的资历最浅。虽然他以枢臣之资，又拥有独班奏事的权力，可以在论事上奏中超过其他宰执，但难免会引起其他宰执官员的议论，如钱象祖、卫泾、倪思之辈。若设立资善堂会议，则可以将群臣关

注的焦点转移到太子身上。太子刚满十七岁,对朝政处理自然不熟悉,而史弥远长期担任资善堂翊善,与太子的关系最为密切,很容易将自己的意见加之于太子,如此便在政务决策中获得优势。更重要的还在于太子能够沟通内廷与外朝,宁宗的最新动向,太子都可以最早获悉并告知史弥远。这一设置,对于资历尚浅的史弥远来说,既可以避免自己过分招摇,惹人议论,又得到牢牢掌权的实际好处,可谓一举两得。因此,资善堂会议的设置,不仅不会削弱史弥远的权力,反而有利于史弥远掌控朝政。所以,当宁宗询问臣僚对于太子参政看法的时候,史弥远表示赞成,并盛赞皇帝的英明决断。

三　皇太子与史弥远独相的最终实现

在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诛韩政变后至史弥远升任丞相之间,中枢官僚层出现了剧烈的人事变动,当初依附韩侂胄者多数遭到免官罢职甚至殒身的下场,而参与政变的官僚则迅速升迁[12]187,189。随着执政的人员更替逐渐完成,内部的矛盾斗争日益显现,政变集团中首先被排挤的是势力较弱的王居安[5]12252,之后是张镃[21]91、李壁[12]188。史弥远之所以能够在与卫泾、钱象祖的斗争中胜出,这与他和内廷杨皇后及太子赵询关系紧密,特别是他对太子的利用,关系极大。

赵询原名赵与愿,系太祖十一世孙。庆元二年(1196)八月,宁宗取宗室子与愿养于宫中[22]528。嘉泰二年(1202),封卫国公,听读资善堂[5]8734。开禧元年(1205)五月,赐名赵曦,晋升为皇子。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十五日,赵曦因为献言诛韩有功,诏立为皇太子,后更名询[22]528。目前可考的两人最早发生联系时间为开禧二年(1206),当时史弥远以起居郎兼任资善堂直讲。后史弥远迁为礼部侍郎,仍兼资善堂翊善。赵询上言罢黜韩侂胄,就是"用翊善史弥远计"[5]8735,足见史弥远善于利用皇子的地位影响宁宗决策。此后,史弥远对政治对手的清理大多可见太子的影子。

史弥远对卫泾的排挤是在赵询的帮助下完成的。据记载:"公(卫泾)俱既史相诛韩,旋用故智,又欲去史。史为景宪太子旧学,太子知其谋于内,遂以告史。"[21]9"用故智"当是指卫泾企图联络宁宗、杨皇后请求罢免史弥远。太子在内廷得知这一消息,便告知史弥远,史弥远遂命信任的御史中丞章良能弹劾卫泾。嘉定元年(1208)六月,参知政事卫泾罢免外任。

嘉定元年(1208)六月甲申,签书枢密院事林大中薨。六月二十三日,史弥远以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十月十日,钱象祖拜左丞相,史弥远拜右丞相。然而,并相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十一月二十二日,史弥远丁母忧去位。丁忧去位意味着离开了权力中心,这对于初登相位的史弥远很不利。然而,正是在丁忧期间,史弥远的最大对手钱象祖被罢相。十二月一日,钱象祖罢相,出判福州,"以象祖累章求退而台臣亦有论列也"[16]职官78之62,5222。这一记载不免让人疑惑。在史弥远离开临安期间,正是钱象祖扩张势力的大好时机,他为什么会主动请退呢?台谏为什么会论列钱象祖?或许可以推测,史弥远仍然是幕后的推动者,与其关系密切的太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嘉定元年(1208)十一月二十七日,史弥远离开临安仅五天,太子上奏宁宗,请求召回史弥远,并赐第临安。太子上言:

> 方弥远密承圣旨,投机之会,间不容发,然犹有顾望,欲迟回其事者,非弥远忘其体命,奉行天诛,万一泄谋,必误大计。陛下轸念南北生灵肝脑涂地,屈己就和,量力相时,初非得已。今和好赖以坚定,虏人持以信服,由陛下独断于上,而弥远能祗承于下,故人心妥安,无复疑虑。如弥远一旦去国,诚恐无以系虏情、慰民望。以此观之,弥远乃陛下腹心之寄、社稷之臣,其一身去留,实天下重轻之所系。欲乞圣慈特赐睿旨,赐第行在,令其得以就第持服。[16]礼62之85,2161

奏章首先赞扬史弥远在诛韩过程中的果断勇敢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还批评了某些顾望犹豫者,这很可能暗指的是钱象祖。据载,在获得密旨诛韩前一天,"钱参政欲奏审,史侍郎夜往其府趣之,李参政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23]48。钱象祖主张奏审密旨的举动可以理解为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也可以说是谨慎从事、确保万无一失,但在此奏文中竟成了证明史弥远果断坚决的证据,实际上是暗贬钱象祖以抬高史弥远。其次,奏文强调史弥远的上台是南宋朝廷与金和议的象征,一旦史弥远离开京城,难免会被金人理解为和议动摇,会导致民心不安。如此明显带有三分威胁的文字,不应该是只有十七岁的太子手笔,只能理解为是史弥远的真实意图表达。宁宗同意了太子的请求,并给史弥远赐第,这说明宁宗也

认可了史弥远在事变中的关键作用，也足见皇太子上言的分量。

台谏官对钱象祖的弹劾，也是史弥远的暗中操作。傅伯成未任谏官时说："诸公要相叶和，共济国事。若立党相挤，必有胜负，非国之福。"又劝钱象祖曰："安危大事，当以死争，小小差除，何必乖异？"[24]4257他试图调解两相之间的矛盾斗争。当其升至谏议大夫，"朝士有善公者来，曰：'宜先摇左揆之客。'公答以不敢。章公良能为中司，以二相不咸，有所左右，公不乐其如此，益坚壁。或致右揆之意，云：'旦夕除执政矣。'公叹曰：'吾岂倾人以为利，且可以官职饵者哉？'遂力论朋党之弊……"[24]4257其中的左、右揆，分别指左丞相钱象祖、右丞相史弥远。有人劝说傅伯成出面弹劾钱象祖一系官员，此人显然是奉承史弥远的旨意，但被傅伯成拒绝。傅伯成拒绝的事情却由章良能来完成。此前，章良能已在史弥远的授意下弹劾卫泾，现在继续弹劾钱象祖。一个月后，章良能自御史中丞除同知枢密院事，这应当是史弥远对章良能劾罢钱象祖、卫泾两人的酬赏。十二月一日，钱象祖被罢免后，史弥远成为唯一的宰相。总之，史弥远在丁忧期间就清理了他的政治对手，这离不开台谏官的作用，更离不开皇太子的暗中借力相助。

四　结论

在韩侂胄被诛杀后，一部分士大夫舆论首先指向了韩侂胄作为近习的特点，认为正是韩侂胄的独断专权导致了对金战争的失败，给国家带来空前危机，他们期望权力回归中书，回归外朝宰相，"公议而公行之"。为了保证中枢权力转移至外朝宰执，防范韩侂胄式的权臣再次出现，他们提出了令太子参政的方案，这正与宁宗无心政事、有意让太子参政的想法不谋而合，嘉定资善堂会议遂得以成立。而钱象升、倪思、何异、黄度、王介等士大夫则走得更远，他们担心韩侂胄式权臣的出现，故认同权力回归中书，与真德秀、王居安、蔡幼学等士大夫观点一致。但当他们看到新的宰执群体中，史弥远一人强势的时候，他们也担心外朝宰执蜕变为新的权臣，于是便主张由皇帝亲擢台谏、并任宰辅的政治模式。然而，这种权力运行模式却不具备实现的条件，原因在于：首先，史弥远为首的政变集团不会让出自己的权力；其次，宁宗在思想上倾向于"委任大臣，政出中书，万事坐理"的理政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资质平庸的宁宗根本不具备乾纲独断、驾驭群臣的行政能力。在资善堂会议的掩护下，史弥远借助皇太子的力量，完成了对政治对手的清理，最终实现了从政归中书到权属一人的转变。南宋宁宗朝权属一人局面的形成，正是当时士大夫舆论、宁宗个人能力、史弥远政治手腕等多维因素共同推动所致。

注释：

①小林晃《南宋宁宗朝における史弥远政権の成立とその意义》，载《东洋学报》2009年第91卷第1期。小林的观点直接受到安倍直之的启发。参见：安倍直之《南宋孝宗朝の皇帝侧近官》，《集刊东洋学》2002年第88卷。

②这一表述出自脱脱等《宋史》卷四〇六《洪咨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265页。类似的"政出中书"或"政归中书"是南宋士大夫议论中出现较多的词汇，如黄裳、朱熹、魏了翁、李宗勉、黄震等人的议论中都有提到。

③"内在理路"是借用余英时对清代思想史研究中的概念。本文所说的"内在理路"是指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具体制度、政治文化、观念以及位于权力顶端的皇帝宰臣等多种因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所呈现的整体状态，或可称之为政治生态。南宋权相政治不能仅从政治势力权力斗争的角度认识，更多需要从政治生态的角度综合考虑各种政治因素来理解。

④"近习"是指皇帝信任宠爱的后妃、宦官、外戚、潜邸旧人等，均非士大夫出身。政务必归于中书，皇帝亲倖之人不得干政，被宋代士大夫视为国家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甚至被提高到"祖宗之法"的高度。韩侂胄属于出身外戚的近习，故其长期擅权被士大夫视为近习干政，遭到强烈反对和批评。

⑤对宁宗的性格特点，何忠礼有所分析。参见：何忠礼《南宋政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3－304页。另参见：韩冠群《从宣押入内到独班奏事：南宋韩侂胄的专权之路》，《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六，天圣六年四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第2470页。按：乾兴元年二月赵祯即位，之后至天圣六年，资善堂会议中的"皇太子"角色由谁来充任，尚需研究；但即便在"皇太子"角色缺位的情况下，资善堂会议仍可运行六年，可见宰执大臣在处理此类事务中的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虞云国.宋光宗宋宁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2]寺地遵.南宋中期政治史の试み[J].日本历史学协会年报,2003,(18).
[3]何忠礼.南宋政治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戴仁柱.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M].刘广丰,惠冬,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
[5]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佚名.宋史全文[M].汪圣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
[7]小林晃.南宋寧宗朝における史彌遠政権の成立とその意義[J].東洋学報,2009,91(1).
[8]刘宰.漫塘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
[10]袁燮.絜斋集[G]//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
[12]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M].汝企和,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13]楼钥.楼钥集[M].顾大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14]卫泾.后乐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G].北京:中华书局,2004.
[16]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7]王应麟.玉海[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18]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M].王瑞来,校补.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赵冬梅.试论通进视角中的唐宋閤门司[J].历史研究,2008,(3).
[20]蔡幼学.育德堂奏议[G]//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8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1]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22]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23]齐东野语[M].周密,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24]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M].王蓉贵,等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The Way of SHI Mi-yuan's Individual Autarchy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N Guan-q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Some officials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 policy under the reign of HAN Tuo-zhou after he was been killed. They suggested that the supreme power should be turned back to government and prime minister. They also advised price to take part in political affairs. So they proposed the scheme of Zishantang meeting. Emperor Ningzong agreed as he had no interest in the imperial power. Some other officials advised Emperor Ningzong hold imperial power himself, but failed. Under cover of Zishantang meeting, SHI Mi-yuan established individual autarch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rown prince. This political pattern is due to bureaucratic public opinion, ability of Emperor Ningzong and political trick of SHI Miyuan.

Key words: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I Mi-yuan's individual autarchy; Bureaucratic political opinion; Zishantang meeting; crown prince; Emperor Ningzong of Song

[责任编辑:罗银科]